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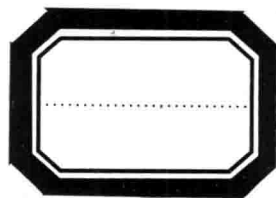
吴廷俊作品

KAOWEN XINWENSHI

考问新闻史

吴廷俊 著

 復旦大學出版社



KAOWEN XINWENSHI

考问新闻史

吴廷俊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考问新闻史/吴廷俊著.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 10
ISBN 978-7-309-10046-4

I. 考… II. 吴… III. 新闻事业史-中国-文集 IV. G219.29-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15276 号

考问新闻史

吴廷俊 著

责任编辑/李 婷

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200433

网址: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门市零售:86-21-65642857 团体订购:86-21-65118853

外埠邮购:86-21-65109143

上海春秋印刷厂

开本 787×960 1/16 印张 33.75 字数 492 千

2013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9-10046-4/G·1232

定价:66.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为吴廷俊文集《考问新闻史》 写的 140 字^{*}

吴廷俊教授由修文转为治史近三十年。曾两次荣获吴玉章新闻学奖。名贯遐迩,成绩斐然。他既有深厚的文学根底,也有出色的史德、史才和史识。文史相通,在他身上得到了很好的体现。他在中国新闻史这个学术园地上所作的耕耘,已经结出了丰硕的果实。他的史论文章,充满了睿智和卓识,值得很好的学习、借鉴和参考。

方汉奇

2013 年 3 月 23 日

* 我把在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新闻史文集的事情报告给方汉奇老师,请他给写个序。他说,年纪大了,写序怕是完不成,就写几句话吧。2013 年 3 月 23 日,收到方老师以“140 字”为主题的一个邮件,打开一看,原来是他为我的文集写的“几句话”。这 140 字,对于我来说是很宝贵的;并且,140 字的微博,是当下传播效果最佳的一种方式。所以,我保留其原汁原味,并放在我文集的最前面,借以抬高“书价”。(吴廷俊)

自序

置疑与考问

对于我来说,从事新闻史的研究和教学是半路出家,因此是从学习开始的,我几十年研究和教授新闻史的过程实际上是学习新闻史的过程。检讨我学习、研究新闻史的经历,尤其是新世纪以来的基本态度和方法,主要体现了两个字,一个是“疑”,一个是“考”。疑是置疑,考是考问。置疑是心态,考问是方法。我学习和研究新闻史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置疑、不断考问的过程。

一、置疑因存疑

《现代汉语词典》解释,置疑就是怀疑。马克思在 1865 年曾经说,他所喜欢的座右铭是“怀疑一切”。马克思所说的“怀疑一切”不是“怀疑论”,而是对任何事情都要问一个“为什么”,不盲从,不盲信,不“人云亦云”。胡适先生说的“做学问要在不疑处有疑”也是这个意思。没有“置疑”的态度,就不可能有“质疑”的行动,不质疑,不考问,哪来创新?“置疑”是严肃学者做学问的基本态度,更是史家治史的应有态度。

置疑是因为历史存疑。存疑是由历史自身的特点所决定的,是与生俱来的。

2 考问新闻史

一般来讲,“历史”有两重意义:一是发生过的涉及、影响众人的事件;二是史家对于这些事件的讲述,包括口头的或文字的。第一重意义上的“历史”属于本体论或存在论范畴,这种意义上的“历史”,由于时间的不可逆性,它成了一种过去的存在,我们谁也看不到,我们通常所看到的历史,是第二重意义上的“历史”,是通过史家的理解和叙述而存在的历史,简言之,是治史者“治”出来的历史。

史家治史,是史家基于史料的解释和叙述。历史已成过去,留下来的是残缺不全的史料,史家须花很大精力收集史料,甄别真伪,但是无论如何,都难以做到史料的“绝对翔实”;其次,史家在进行历史解释时必然会融入自己对于历史的生命体验,忘身到无尽绵延的历史整体中去,聆听那由在场与不在场相结合的无底深渊中发出的声音,从而呈现出他自己的历史,难以“绝对客观”。因而,任何史家“治”出来的历史都难免不打上自己的烙印,都不可能完全符合“发生的历史”的真实,这就决定了历史研究只能是一种“遗憾研究”,即使再伟大的史家所叙述的历史都会留下后人研究的空间,都会“存疑”。

再者,随着人类的生产实践水平与认识能力的提高,旧的历史解释被推翻与改写,新的历史解释在不断呈现,历史研究就在这种不断“扬弃”的过程中,去逼近“发生的历史”。因此,历史研究是客观发生的“历史”与现实永远的对话过程。史家只有与时俱进,不间断地发掘新史料,不间断地进行新解读,不间断地质疑与考问,才能有新的历史呈现。

以上说的是一般情况。中国历史更是处处“存疑”。自古以来,中国就有盛世修史之说。盛世修史就是胜利者修史,统治者修史。胜利者修史,实际上是撰写自己得意的历史,统治者修史,实际上是撰写他们是如何取得政权的历史。因此,难免贯彻“以我为主”的原则,难免渗透出“成王败寇”的价值取向,“抬高自己,而贬低失败者”,甚至不顾历史事实,完全按照自己的意志,编造一部历史。此外,中国文化中,还有一种“为尊者讳”的潜规则,把统治者的缺点掩盖起来,或者抹杀掉,这样的历史,其真实性又大打折扣。记得鲁迅说过,中国的历史,每一个字都可疑。

历史存疑,因此无论是读史,还是治史,都必须以“质疑”的心态对待之。

二、存疑须考问

对于存疑的“历史”，持“置疑”态度，是必须的，但是仅仅“置疑”是远远不够的。历史研究之目的乃在求得历史之真相，这个历史真相是前面所说的发生的历史的真相。仅有置疑，不仅不能使历史“释疑”，而且还会使读者陷于永远的“疑惑”之中，永远找不到历史的真相。为此，我们还必须把这种“置疑”的态度付诸行动，那就是考问，主要包括史料考证、史实考释和史论考辨三个层面。

何谓史料？史料是“研究史学撰著史籍所必须根据之种种资料”^①。我们强调解释在治史中的作用，强调史家的主体性，然而，这与历史相对主义有原则区别。在他们看来，历史只不过是史家按照自己的理解和想象建构起来的，一切历史现象都是相对于历史认识者自己的主观认识而存在的，历史自身不具有独立于人们主观认识之外的客观实在性。他们完全割裂了历史存在与现实之间的内在联系，不认为史家的解释是以史料为基础的。我们承认史家的主体意识，我们更看重史料的重要性，认为史料是历史研究的前提和基础，史家于历史之解释是全部奠基于历史史料之上的。没有史料，治史无从着手。正如方汉奇先生所言：“没有‘史料’，还搞什么历史？没有对‘史料’的充分掌握和过细研究，没有对重要的关键的‘史料’的考订和甄别，是不可能对历史事实作出正确的分析和论断的。一切从概念出发、先入为主、脱离实际、游谈无根的做法，都是历史研究工作者的禁忌。”^②

前面说了，发生过的历史已经过去，留下来的只是一些史料，并且这些留下来的史料还是“残缺不全”的。“残缺不全”的史料，对于发生过的完整的历史事件来说，那只是“九牛一毛”；而“九牛一毛”的史料，对于史家个人来讲，也算是“浩如烟海”。有人认为研究近代史，无论如何刻苦用功的人，都不能阅读已经出版的书籍的四分之一^③。面对这浩如烟海的史料，要选

① 王尔敏：《史学方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22页。

② 方汉奇：《方汉奇文集》，汕头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5页。

③ 杜维运：《史学方法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8页。

4 考问新闻史

择有用的史料,非轻而易举可得。加之史料的价值判断、真伪辨别更是难上加难,“史料认识与采集方面,则全恃史家识力之判断”^①。故史料收集、整理、考证是治史者的基本功,史家治史,首先要练好这个基本功,练就“火眼金睛”,认识史料的价值、考证史料的真伪。

我们认为史料重要,但我们不是史料主义。史料虽然重要,但是史料不是历史,经过史家在遗存的史料片段之间建立逻辑联系,由此呈现出来的才是“历史”。“史料”和“历史”的中间还有一个概念,就是“史实”。史实是经过史家选择、考证并解释后的史料,即是加工后的史料,是历史的“半成品”。在西方,“历史”一词起源于古希腊文的“histora”,它的最初含义就是讲故事、叙述;史家就是讲故事的人。过去发生的历史,只有在被人发现并通过解释揭示出来后,历史才能去蔽而为人所知。“任一客观资料,其能产生历史价值者,皆经解释而得,亦因解释而明。至于更精义之解释,则在于以解释而建立全貌。……史家所能以提供历史知识者,则必须经过解释,方可成为知识。此史家之天然使命,非如此即不足以称为史家,直抄胥而已。”^②历史学识修养之于史实是非常重要的,历史研究者必须克服主观和客观的各方面条件限制,使其解释出来的史实是“史实”,即尽可能符合发生的历史的真实。史实真实是历史真实的基础。

史论,是史家对历史研究所作出的结论及通过某种方式表示的观点。史家治史,非发思古之幽情,而是为当下提供历史镜鉴,即“以正确研究解释建立人类过去活动之重要史迹,使后人如参考记忆中经验,足资采择以适应现在创造未来者”^③。为此,史家对历史的研究必然要作出自己的结论,在史籍中必然要表达自己的观点。当然与纯粹的论著作家直接表达自己的观点和主张不同,史家观点的表达是隐含的,隐含在对史料的选择上,隐含在对史实的解释上,当然也有如“太史公曰”那样的表达方式。作为历史镜鉴,史家对历史作出的结论须尽可能恰当。结论的恰当与否,首先取决于史家是否有正确的历史观,即辩证唯物主义史观,使自己的研究建立在史料的基础上。史家治史,切不可先入为主,应做到论从史出;力争做到言必有征,字

① 王尔敏:《史学方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22页。

② 同上书,第164页。

③ 同上书,第108页。

字有出处有根据。你的结论必须要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和后人耳朵质疑。后人治史,也要基于历史事实,联系当时政治、经济、文化背景,对前人叙述“历史”中的结论进行考辨。

三、我对中国新闻史的考问

老一辈的新闻史家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在中国新闻史研究方面,无论是史料积累,还是范式建构,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新世纪以来,《新闻大学》编辑部组织部分新闻史研究者就如何进一步提高新闻史研究水平的问题进行了几次笔谈,论者见仁见智,其说不一。我以为,当前中国新闻史研究领域存在的最大问题是学术内卷化。所谓“学术内卷化”,据美国研究中国史的专家杜赞奇的说法,是指在当下,学术研究不能提供新的知识,无法产生新的边际效应,只是在不断重复自己和别人,缺乏史家通过研究成果所表现出来的真知灼见。方汉奇教授说,近几年中国新闻史研究“成果的内容有交叉和重复。这一点在教材类的成果中,表现得尤为突出。据复旦大学丁淦林教授所作的初步统计,已出版的以《中国新闻事业史》、《中国新闻传播史》之类的书名命名的教材和与之配套的‘大纲’、‘文选’等辅助教材,已接近60种……其中有不少属于低水平的重复,没有太多的学术价值”^①。“学术内卷化”状态令新闻史学界呈现出“集体焦虑”。这种“焦虑”是一种积极的情绪,带着这种情绪,大家都在探索走出“内卷化”的路径,并且有的已经开步前行了。我的路径是“重考”,即对以往史家叙述的“中国新闻史”从史料、史实、史论等层面进行一番必要的考察,或推陈、或出新,为中国新闻史研究“出新”做一点贡献。

下面略举几例。

关于“史料考证”的典型例子,是对新记《大公报》史的研究。在这个研究中,我十分注意并且花了很大气力进行第一手资料的搜集与考证。(1) 花费整整四年的时间,翻阅了新记《大公报》23年几乎全部报纸,摘录

^① 方汉奇:《方汉奇文集》,汕头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7页。

了几百万字的原始资料,并分类做卡;(2)通过各种途径广为收集有关《大公报》的回忆录,从中了解到报馆内部的机构设置、人员调配、管理制度以及一些重大活动的开展情况;(3)联络访问星散在海内外的《大公报》老人,发掘“活”材料;(4)对收集到的一些说法不一,甚至彼此矛盾的资料进行考证。由于史料工作做得扎实,不仅撰写出标志着当时《大公报》研究“新的高度”的著作《新记〈大公报〉史稿》,而且对已经出版的相关著作中的史料错误进行了严肃的订正。方汉奇老师在序中写道:吴廷俊“重视第一手资料的研究,不是想当然地凭印象说话,不人云亦云,力求做到言必有征,字字有出处有根据。为了掌握第一手材料,他曾经用四年时间,通读了新记公司时期几乎全部的《大公报》,作了详细的札记,订正了不少前人的文章和专著中史实上的夺失。仅徐著《报人张季鸾先生传》一书,就被他订正 53 处”^①。

关于“史实考释”的典型例子,是对延安《解放日报》改版的考释和对毛泽东“政治家办报”的考释。

1942 年延安《解放日报》改版是真实的历史事件,并且是研究中国新闻史一个无论如何都绕不过的事件。《解放日报》改版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是延安整风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延安整风”是毛泽东亲自领导的一场政治运动,是中共历史上极为重要的政治事件之一。但是,以往的新闻史著作和教材,仅仅把它当作新闻事件看待。比如《中国新闻通史》从抓文风说起,再说改版前的准备,后说 1942 年 4 月 1 日开始改版。具体论述了重要改革的“几个方面”: (1) 版面改革。(2) 社论的改革。(3) 新闻报道的改革。(4) 副刊的改革。(5) 各版栏目的改革。最后用陆定一 1944 年 7 月 1 日在编委会上的一段话总结改版的成果:“《解放日报》对中央的关系改善了,对边区各级党组织的关系还好,群众活动的报道属全国第一。”这样的论述仅仅局限于一张报纸的改版,视野过于狭窄,只在改版的一些具体问题上展开论述,没有抓住“改版”与“整风”的关系,大大降低了“改版”的意义。

我抓住“毛泽东”和“延安整风”这两个关键词,从“改版”与“整风”的

^① 方汉奇:《新记〈大公报〉史稿》序,武汉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5 页。

关系入手,从党内斗争的高度进行考察,看到延安《解放日报》改版不仅仅是一次报纸改版,不仅仅是一次报纸改革,也不仅仅是一次新闻事件,而是作为全党整风运动的有机组成部分,是毛泽东改造党的文化宣传部门的具体步骤之一,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次重大的政治事件,因此《解放日报》改版成功的意义远远超出新闻界。从根本上讲,它首先在一个“特殊的部门”即文宣部门彻底肃清王明、博古的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影响,然后利用文化队伍和新闻媒体,在全党树立起毛泽东的政治威信和思想威信,使全党认识到毛泽东的领导不仅在军事路线是正确的,而且在政治路线、思想路线上也是正确的。对于一个领袖人物来讲,取得军事指挥权固然重要,但是政治领导权和思想话语权则更重要,从这一点上看,《解放日报》改版是毛泽东在中共党内最终确定领袖地位的关键。事实上,改版后的《解放日报》以贯彻遵义会议后党的正确路线和毛泽东的思想,肃清王明、博古错误路线的影响为宣传方针,通过对整风不同阶段的宣传报道,迅速树立起了毛泽东政治上、思想上的权威,为中共七大的胜利召开做了舆论上和思想上的准备。

由于近代社会“救亡图存”的需要,中国新闻史的发展形成了鲜明的“政治家办报”的传统,这是一个既符合中国传统文化,又适合中国近代社会需要的好传统,“政治家办报”在中国近现代新闻史上大放异彩。但是为什么1957年以后,在“政治家办报”的标榜下,中国的新闻媒体形象越来越不光彩,作用越来越具有破坏性——在反右派斗争中,为“阳谋”的实施充当“引蛇出洞”、围剿右派的工具;在“大跃进”年代,报纸上“满纸荒唐言”后面掩藏着老百姓的“一把辛酸泪”;“文化大革命”期间,新闻媒体助纣为虐,堕落成为阴谋家篡党夺权的工具。这两种情况都是事实。为什么“政治家办报”前后出现如此大的反差?经过研究发现,1957年后问题的症结在于,不是传统的“政治家办报”,而是毛泽东的“政治家办报”。

1957年,在反右派斗争前夕,毛泽东在批判邓拓的“书生办报”的时候,提出了他自己的“政治家办报”主张。邓拓对毛泽东提出的“大鸣大放”“无动于衷”,甚至“唱反派”,毛泽东对此十分恼火,斥之为“死人办报”,并提出与之相对的概念——“政治家办报”。毛泽东说:“从政治上总揽全局,紧密结合政治形势。这就叫政治家办报。”接着对吴冷西说,中央想调你去《人民

日报》主持编辑工作,要加强《人民日报》的领导力量。并说,两个月前他曾经批评《人民日报》没有宣传他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精神,对最高国务会议无动于衷,只发了两行字的新闻,没有发社论,以后又不宣传。全国宣传工作会议甚至连新闻也没发。中央党报办成这样子怎么行?写社论不联系当前政治,这哪像政治家办报?^①

通过对毛泽东关于“政治家办报”讲话具体内容和背景的分析,看到毛泽东的目的在于使新闻媒体无条件地随着主要领导人个人意志“转”。考释毛泽东的“政治家办报”,“可以探知这个时期中国新闻界发生的几乎所有大事的来龙去脉,甚至可以进一步求解中国新闻媒体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所作所为的前因后果”^②。

关于史论考辨的典型例子,有对新记《大公报》评价的考辨,有对北洋政府时期新闻史定性的考辨。

首先说对新记《大公报》评价的考辨。长期以来,有几顶帽子压在《大公报》的头上,使得它蒙冤受屈几十年。《新记〈大公报〉史稿》对该报的几个历史结论——“小骂大帮忙”、“国家中心论”、“官僚资本还是民族资本”、“政学系机关报还是民间报纸”——的质疑进行新的考释,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大公报》不是一张“反动报纸”,而是一张“爱国报纸”,并且这张报纸还为中国新闻界在世界上争得了荣誉。强泼在《大公报》头上的污水都应该予以洗清。许多健在的《大公报》老人读完《新记〈大公报〉史稿》后热泪盈眶。

其次说对北洋政府时期新闻史定性的考辨。长期以来,史学界对北洋政府时期的历史评价不高,对这个时期的报业评价更低,近乎于全盘否定,说这个时期的新闻界是极其黑暗的、腐败的。但是从报业现代化的视角进行重新考释,则看到另有一番天地。这个时期,中国报业格局实现了“两个转型”、“一个启程”:官报、党报主流到民营企业报主流的整体转型;报纸内容完成了从政论本位到新闻本位的大转变;职业报业启程并步入现代化。这些变化是以往其他时代不曾有过的。到底该如何评价北洋时期的报业发

^① 吴冷西:《忆毛主席》,新华出版社1995年版,第40、41页。

^② 吴廷俊:《“政治家办报”——研究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新闻史的一个关键词》,《国际新闻界》2010年第3期。

展,结论是不言自明的^①。

四、加强史学修养,增加“考问”底气

史家史学修养决定了史学研究的水平。“治新闻史的学者的史学意识不强,史学功底明显不足,是当下中国新闻史研究的瓶颈。”^②新闻史研究者要加强史学修养,才能增强“考问”底气。

中国的史家历来重视史学修养。唐代刘知几在总结唐前和唐初史学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著名的“史才三长”论,说:“史才须有三长,世无其人,故史才少也。三长,谓才也,学也,识也。夫有学而无才,亦犹有良田百顷、黄金满籝,而使愚者营生,终不能致于货殖者矣。如有才而无学,亦犹思兼匠石,巧若公输,而家无榱桷斧斤,终不果成其宫室矣。犹须好是正直,善恶必书,使骄主贼臣所以知惧,此则为虎傅翼,善无可加,所向无敌者矣。脱苟非其才,不可叨居史任。”刘氏所说之“才”,主要是指史家的文字表述、体例编排和文献运用能力;所说之“学”,主要是指史家各方面的知识;所说之“识”,主要是史家之器局与胆识。清代章学诚又提出“史德”论,将“史才三长”发展成“史才四长”,丰富了史家修养之内涵。章学诚认为,“能具史识者,必知史德。德者何?谓著书者之心术也。”史家唯有慎于“心术”,才称得上有良史之德,“盖欲为良史者,当慎辨于天人之际,尽其天而不益以人也。尽其天而不益以人,虽未能至,苟允知之,亦足以称著书者之心术矣”。在章氏这里,“天”即指历史的客观规律,“人”指的是史家的主观性。史家要“尽其天而不益以人”,就是要求史家尊重客观历史,在历史研究中排除史家之价值预设,以保持历史的真实。对于史家而言,“识”是史家的历史观,即史家对社会历史的总的看法和基本观点,是对历史展开过程的基本认知框架。只有在自己的历史观中,历史才可能真正发生,史家才能完成自己对

^① 吴廷俊:《民报主流发展与职业报业启程:北洋政府时期新闻史重考》,《国际新闻界》2012年第8期。

^② 吴廷俊、阳海洪:《新闻史研究者要加强史学修养——论中国新闻史研究如何走出“学术内卷化”状态》,《新闻大学》2007年秋季号。

历史的讲述和还原,寄托自己的专业梦想。史观从何而来?史家唯有摆脱各种定见,走进历史深处,让自己的身心去拥抱历史,融进自己的生命体验,这样的历史才是属己的历史。这种“属己”的历史观是有限的个体生命向无限历史的追问,是史家和历史的相互占有,彼此从对方那里消失并得到实现。唯有如此,历史才能不再是外在的教条和顶礼膜拜的神话,也不是以当代意识形态强加新解的故纸,而是史家历史体验中激发出来的生命记忆,才是真正的历史洞见。近人梁启超对“史才四长”提出了“德”、“学”、“识”、“才”的排列顺序,特别把史德放在首位。

他们的观点虽然略有差异,但是本质上是相同的。学习先辈学者对史家的史学修养的论述,我是深受教益。我以为,“德”是史家“独立不阿”的人格;“识”是史家坚持“秉笔直书”的胆略;“学”是治史的理论与方法;“才”是史家史料搜集、史实考证和文字驾驭的能力。“四长”相依相存,同等重要,缺一不可,似乎没有重要次要之别。先辈学者各人强调重点不同,是因为他们所取的角度不同而已。史家要写出对历史负责,经受历史检验的史书,必须心存“良知”,具备“独立不阿”的人格,不屈从,不逢迎,秉笔直书;但是“秉笔直书”何其难?历代统治者对于不符合己意的历史撰述,往往横加摧残。《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记载,齐国崔杼杀死了国君后,大史书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杀之。其弟嗣书而死者二人。其弟又书,乃舍之。南史氏闻大史尽死,执简以往。闻既书矣,乃还。这种“头颅掷处血斑斑”的血色记忆成了中国史家难以挥去的历史梦魇,历史叙述难以突破权力所设置的“红线”,所以先辈史家把“胆识”放在很重要的位置加以强调。清代著名诗人袁枚说:“作史三长:才、学、识,缺一不可。余谓诗亦如之,而识最为先;非识,则才与学俱误用矣。”

史学修养之于史家来说,不是什么深奥的理论问题,而是实实在在的实践问题。我自己的体会是,在日常的研究实践中注重史学修养,努力提高德、识、学、才水准,这些努力必然会在撰著中有所体现。方汉奇老师在为我的《中国新闻史新修》写的序言中,在充分肯定该书的创新之后说:“所有这一切,都充分地体现了作者的真知灼见,他的开阔的视野,他的实事求是的治学精神,他的理论勇气,和他对整个中国新闻事业史的全局的准确的把握。中国的史家历来有讲究史胆、史识、史才的传统,作者于此三者都有所

追求,也都有所表现,是十分难能可贵的。”^①我知道,在这方面我做得还不够,方老师的话是对我的鼓励和期望,我今后当加倍努力。

2012-10-15 初稿

2012-10-30 修改

2012-11-4 再修改

^① 方汉奇:《中国新闻史新修》序,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页。

目 录

自序 置疑与考问	/1
----------	----

新闻通史论

试论辛亥革命时期革命报刊宣传工作的缺憾	/3
中国社会结构变化与报业格局重组	/15
延安《解放日报》改版与毛泽东在党内领袖地位的确立	/31
媒介生态视野下中国新闻事业的历史景观	/42
“恐龙现象”	
——民营报纸在中国大陆“集体退场”的历史考察	/60
对“学习苏联新闻工作经验”的历史考察	/83
“政治家办报”	
——研究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新闻史的一个关键词	/94
秉持公心 发言论事	
——“书生办报”再检视	/108
民报主流发展与职业报业启程：北洋政府时期新闻史重考	/136
多元媒体群落不均衡生长	
——南京国民政府前十年的媒体生长状态考	/151
“渐进改革，边缘突破”	
——新时期中国新闻传播事业改革发展的路径	/178

新闻思想史论

对“耳目喉舌”论历史的回顾与反思	/199
来自市场,须回归市场	
——谈我国新闻改革的前途	/207
典型报道理论与毛泽东党报思想	/214
神圣的职业与高尚的职业道德	
——论新闻工作者的职业道德修养	/223
“健笔终存天地间”:论邓拓与书生办报	/234
新闻伦理与党报兴亡	
——《中央日报》终刊一周年祭	/247
新闻史研究者要加强史学修养	
——论中国新闻史研究如何走出“学术内卷化”状态	/264
名记者的界定与认定	/279
试论“从政治家的角度解读毛泽东新闻思想”	/286

危机传播史论

我国公共危机传播的历史回顾与现状分析	/305
理念·制度·传统	
——论美国“揭黑运动”的历史经验	/316
新媒体时代中国舆论监督的新议题:网络揭黑	/328

大公报史论

新记《大公报》成功的原因究竟是什么?	/343
开报纸社会服务版先河的《大公报·摩登》周刊	/352